

美国



詹姆斯集

20世纪
外国文化名人
书库

上海远东出版社

詹姆士集

万俊人 陈亚军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

责任编辑 殷卫星

封面设计 赵小卫

屠姆斯集

ER SHI SHI JI

WAI GUO WEN HUA MING REN SHU KU

万俊人 陈亚军 编选

出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编200233)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印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千字 406

插页 4

版次 1997年11月第1版第1次

印数 1-3000

ISBN 7-80613-489-1 / C·24

定价: 20.00 元

ER SHI SHI JI
WAI GUO WEN HUA MING
SHU KU

20 世 纪 外 国 文 化 名 人 书

G REN

库 编 委 会

主 编

林贤治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德峰	叶廷芳	刘文飞
吴伯凡	张志扬	孙 晓
林一安	尚 杰	林贤治
苏国勋	郭宏安	倪培耕
钱满素	章国锋	樊 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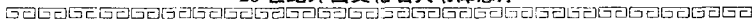
出版说明

世纪之交,人文学术的发展历程需要回顾和检审。这是前进中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要,而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当代西学所获得的相当程度的积累则使这种回顾和检审成为可能。于是,我们组织学界人士翻译、编选《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文化名人”,仅是一个因俗的称法,人物之入选以学术价值为重,至于每种人物专集之选文,都旨在真实反映该人物的思想特征和学术见解的原貌,供读者面对其人其文,分析、研究、借鉴、批评。

立志固高,行有未至,我们热诚期待学界的促进。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总序

季羨林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永恒不断流逝的时间的长河中,到了一定的时候,应该回头看一看,看看走过的历程中自己走得是否都完全正确,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扬弃。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古人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前车覆,后车戒”,通常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两句话表面讲的仅仅是反面的经验,也就是教训。但是其中隐含着“前车不覆”也是“后车之鉴”的正面的经验。

所谓“一定的时候”,可能短到只指一天,而长则是无限制的,一般的是一年,十年,百年。如果制订几年计划,则在计划结束后,也必须回头看一看,算一下总帐,目的都在回顾前车之覆或不覆以决定后车如何走法。

当前,我们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都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再想得远一点,是处在一个新的“千纪末”中。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时刻。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世纪或千纪都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什么先天的必然性或必要性。试想:如果没有耶稣和耶稣教,哪里来的什么“世纪”和“千纪”。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则是:既然人们制造出来了“世纪”和“千纪”,它们就起了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世纪末和千纪末,现在都不是第一次。然而全国和全世界都承认,眼前的这个世纪末和千纪末同过去的都不一样。由于

科学技术的惊人的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工具方面的突飞猛进,用一些人使用的形象的说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产生“蝴蝶效应”等等的理论,决不是偶然的。已覆的前车历历可数。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高呼“环保”,其声震天动地。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也让我们这些忧天的杞人感到点安慰。然而,就我个人浅见所及,高呼“环保”而不从事实的发展中,特别是从思想的高度和哲学的高度上,来探索环境之所以必须保护,环保工作之所以是火烧眉毛的紧迫工作的根本原因,这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实在为愚陋如不佞者所难以理解。

总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纪末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末。

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谈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就应该回头看一看,看一看在过去一段行程中车行和车覆的经验和教训,以决定今后的走法。现在正是这样的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应该回头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而是整个的世界。

正在这样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关键时刻,上海远东出版社不惜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我想,谁也不会吝惜对此举的赞誉。出版社提出的方针,虽然重点是放在人文精神上;然而,大家都会理解,人文精神是指导人类社会前进的关键精神,它是龙头,它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抓住人文精神这一条纲,则纲举而目张,提要而勾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打算。

为什么单单举出“外国文化名人”呢?中国《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富有哲理而又明了形象的话,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远东出版社之所以选外国名人,我想其故就在这里。

对于入选的这几十位“名人”中的某一些人,中国学术界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怪,不这样才是怪事。但是,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入选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的。这些名人,时代有先后,治学有专精,影响有大小,造诣有高低。

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文精神的发展,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常讲,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对这些“名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定要分清他们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以便决定我们的去取。这话实际上已成为老生常谈,不用我说,大家也会明白的。

但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清精华与糟粕,来决定我们的去取呢?精华与糟粕,说起来明白如日月经天;但实则是泾渭并不分明,而且随时代的推移,有时候还会转化,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我个人的想法是: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我为主”,不能喧宾夺主;以我们目前的需要为主,决不能陈义过高或过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甚至幻想。那样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直接的借鉴,中国没有,外国也不会有。但是,间接的借鉴,就算是“前车之覆”吧,则是能够找到的。我说的“以我为主”,就是指以我国当前的实际为主。外国名人的思想中,对这个当前的实际有用的,我们则吸收之,否则则扬弃之。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探讨与辩论。

但是,非常遗憾——至少我这个喜爱忧天的杞人觉得遗憾——,我发现我们学术界少数人有一种不正之风,“不正”二字加起来就成为“歪”字,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歪风”,还需要再加上两个字“邪气”,才算完整。他们膜拜外国“名人”,或者并非“名人”,或者在成为名人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预备名人”,拜倒在这些人的脚下,战慄兢兢。一听到中国人有什么新的理论,就笑得连鼻子都想笑歪,鄙夷之态可掬。用“崇洋媚外”这个词儿,有点刺耳,就改用一个比较文雅一点的“贾桂思想”吧。在这些人眼中,只有外国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才有天才,才有权利来创建新理论。在国际学坛上,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无声的中国”。对于这种现象,我实在觉得悲哀而又凄凉,可叹而又吃惊。

我对眼前外国的各种学科的新理论要说知道得很多,那不

是事实，而是吹牛。要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也不是事实，而是撒谎。我对这些新理论了解一个大概起。有些新理论，就像时装一样，“蟋蟀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赵翼的两句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说明我对这些风起云涌转瞬又风吹云散的所谓理论的看法。对待这些新理论，我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弄通，然后实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评价。拒而不学，决不应该；顶礼膜拜，大可不必。后者不应该是一个学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人应有的态度。眼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扬弃“贾桂思想”，还我一个堂堂正正身。

现在，这一套“书库”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我们眼前了。外国的原作者都可以算是“名人”。书中包含着他们的智慧，当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经验与教训共处。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一套书呢？我个人认为，我在上面刺刺不休地讲的那一些话，就是我们对待这一个书库的准则。首先，书中必有“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识别和利用。其次，这一些书都是“他山之石”，我们用它来“攻”我们的“玉”。第三，“以我为主”，以我们当前的需要为主，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我们要按照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细致鉴别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决定吸收或者扬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点是含糊不得的。如果某一些富于“贾桂思想”的人士，在膜拜当今外国那一批风云变幻，乍起又落的“名人”、“准名人”或“候补名人”之余，又来膜拜这一批已经成为“名人”的大菩萨，则我期期以为不可。是为序。

1997年8月12日，北京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主编开卷语

林贤治

时间的发现与分割,无疑是人类伟大的文化智慧之一。世纪,作为一个长时段,必然穿透个人而接连更多同类,抵达辽阔的界域,承载且激荡着丰富的内容。世纪令人怀想全人类。时间与空间有一种庄严的对称。

此际,我们即将到达 20 世纪的入海口。

远溯世纪的源头,便见绝壁重渊,狂流乱注。两次世界大战,漫过短暂的空隙地,蜿蜒至半个世纪;虽然最终为人类意志所遏止,留下的废墟毕竟是巨大的。奥斯威辛至今不长青草。19 世纪,共产主义幽灵犹在西欧徘徊,这时屹立东方,热烈而坚定,恰如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为十月革命犁耕的土地,崛起苏维埃政权,继而又红了欧亚一大片,甚至点染了美洲金瓯一角。30 年代经济大危机过后,几十年间,不复发生如此惊险的故事。“看不见的手”在加紧运作。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仿佛已经穿越有关垂死的预言,平稳进入卡恩所称的“大过渡”。及至 80 年代末,苏联东欧遽然发生戏剧性演变,致使那些历史的过客在柏林墙的坍塌声中纷纷谢幕。所有这一切,其实仍然不能称作“意识形态的终结”。社会主义以其固有的力量,使东方一个传统深厚的民族,在现代化变革的进程中,保持独特的丰姿。

整个当代科学,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人们

的联系方式、生活方式、斗争方式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政治,影响更为直接。与此同时,科学也以其内在的动力,给予社会以影响,甚至充当变革的先导。作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的科学文化的产物,现代医学、无线电、汽油发动机、相对论、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化形式,对社会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20年代量子力学的新生,尤其突出地显示了科学的现代性。50至60年代,核子物理和原子能的应用;60至70年代的自动化和控制论;70至90年代,计算机、微电子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推广,所形成的冲击力更是前所未有的了。总之,愈到了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便愈加迅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同样发生了许多富有时代特点的变化。各种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裂变,渗透,整合同时进行,互补性原理成了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架。整个当代科学,处于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向之中。习惯性思维,正统的观念意识,现成的定律及范式之类,遭到进一步的怀疑和挑战;绝对权威不复存在。封闭是愚蠢的。个体性,差异性,偶然性不容忽视。没有万古长存的事物,因此变革不能停顿。打破现存的秩序,从无序到有序。统一并非操纵,它仅只意味着事物间的某种关联。既有控制,必有反控制,如此才构成了“系统”……普利高津在描述最近20多年来自然观发生整体的断裂时,指出:这种断裂绝不可能是某一单独领域造成的结果,而是广泛的现象,产生时带有爆裂声,并且可以扩展。爆裂的声音虽或遥远,微末,隐约有闻;然而它是切实的,所以能够鼓舞心灵,使我们感知未来的震荡。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问世以后,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问题,还有海洋及空间问题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未来学界,各种极端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论调都出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被告知:科学本身潜在着使徒和魔鬼两种力量,而且一直处于冲突之中。当科学技术走向成熟,或者说,当它从掌握自然力量进而左右人类生活时,文明危机便随之发生了。

所谓文明危机,其实是意义危机,价值危机。因此,如何从

事文化主体的精神品格的建设,是横亘在我们与时代之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的发掘者和播种者,是精神文化的体现者和改造者;但同时,又是社会危机和历史责任的一大承担者。

古代的人文学者曾为贵族和教会写作,自然科学家为雇主工作,直至 15 世纪,科学和艺术仍然沦为神学的婢女,我们很难从中窥见人文精神的闪烁的微光。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情况渐渐有了改变。经验科学正步进入信仰的地盘,驱赶其间的迷雾,理性之光使认识升华;虽然后来有着对“非理性”的阐扬,而其实,那是对无视人类更广大的精神领域的专断与僭妄的理性的抗议罢了,结果维护了人性的健全。自近代以降,科学文化不断获取“新工具”,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寻找灵魂。知识分子以其创造性劳动服务于人类,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表达了对社会的关怀。由于知识分子的理性自省能力的增长,人文思想的血脉非但不会中断,二战以后,特别在今天,对于人类,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以及未来的关切,几乎成为知识界压倒一切的主题。

今天,我们着手编辑“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本意在于通过个人选集的组合方式,显示接连几代知识分子的基本风貌,勾勒出本世纪人文思想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是初步的素描,尚谈不上严整的巨幅壁画。

前人有“万有文库”,万物皆备于我,可谓懿欤盛哉;但以我们的能力和条件,大抵只好择取一组组断面了。自然,不求完备也未尝不可以算是一种选择。外国近代思想的译介,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可是,多少经典性作家,至今没有他们的译本,甚至连名字也鲜为人知。对于一个文化大国来说,这是很不相称的。庞德说,伟大的文学世纪必然是翻译世纪。广而言之,文化也一样。有鉴于此,当我们做着世纪性的文化总结时,就决意把国内的部分割让出去了。剩下的工作,也就是手头要

做的工作,用鲁迅的话来说,还是叫“盗天火”罢。

作为这样一套大型丛书,本当不限于文化积累的;最根本的目的,仍在于现代文化的重建。当此全球信息一体化的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我们唯有汲取异质性的思想观念,文化知识,人文素养,才能从一个先天的传统的体系内部,创造出有利于保存、发展和完善我们自己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部“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在上海出版,使我们深怀一种温暖,遥遥缅想那里的创榛辟莽、筚路蓝缕的一代翻译界先驱。在中国现代化的启蒙时期,他们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全国的译书中心——所凝聚,口述笔译,中外参证,推敲译名,另铸新词,掀起了西学东渐史的第一页。

有一部日本思想家撰写的著作《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于1901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出版后,即遭政府当局查禁。1927年,曹聚仁先生将它重新标点出版,赞叹道:“在25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比起时代要求于我们的,我们着实做得太慢了,太少了。

在又一个世纪的钟声即将鸣响的前夕,谨以此书库为人类思想文化生生不息的洪流作涓滴奉献。

1996年7月,广州

编选前言

人类保持自身文化记忆的方式有许多种,其中有实物建造的方式,如,修建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纪念碑;有习俗礼仪的方式,如,风俗节期、教会仪式;还有思想言语的方式,如,言传身教、文字阅读,等等。编辑往者的文字作品大抵兼备实物建造和思想言语两种方式的特点,其形式是文本的重编,而其内涵则更在于思想言语。因此,这种方式就成了千百年来人类保存文化、延伸自己文化记忆的最基本也是最普通的方式。然而,真正值得人类记忆且能够被人类记忆的往者或往者之文字作品并不多,尤其是从跨文化、跨区域和跨时代的角度来看。之所以如此,盖因进入人类永久之文化记忆的标准(所谓“值得”者)十分苛刻,非等闲之辈所能致达。可是,无论将这种标准定得多高,都不会使我们编辑和阅读威廉·詹姆斯的文字作品失去充分正当的理由:他不仅是一位真正富于创造智慧的思想者,而且是以其哲学和思想影响(甚至可以说预制)了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哲人。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 1. 11 ~ 1910. 8. 26)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充满神学气氛的家庭。其父有很高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造诣,对詹姆斯的早年生活和性格影响甚深。少年时代的詹姆斯先在纽约上学,后随全家游历欧洲,曾先后在法国和瑞士的多座城市就读。因家庭迁居频繁,他自幼身体状态一直不佳,学习兴趣常变不居。这一状况直到 1860 年全家返回美国新英格兰罗德岛新港以后才有所改变。回国后,他开始学习

绘画,收获寥寥;翌年考入哈佛大学劳伦斯理学院攻读化学和比较解剖学,后转入哈佛医学院,但因体弱多病,学习时断时续。1867年,他赴德国学习当时颇为流行的心理学和哲学,拜于心理学名家赫尔姆霍茨和冯特门下,同时也对法国伦理学家雷诺维叶的道德学说发生了兴趣,不久又因健康太差、精神萎靡而中途回国,重新回到哈佛医学院。1869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随之在家养病。两年后,他开始参加由皮尔士等人在麻省剑桥组织的“形上学俱乐部”,着手探究哲学和心理学的一些前沿问题。1872年,他受聘担任哈佛大学的生理学讲师,四年后改任哲学副教授,此后,他转向心理学和哲学。他力图把传统的作为“心灵科学”的心理学改造成为实验科学,并亲自培养了现代美国最早的一批心理学博士。1878年,詹姆斯与吉本丝结婚,身体状况开始好转,学术功力也随之大增。两年后,他便出版了两卷本的《心理学原理》,首先提出了现代心理机能主义的基本学说,同时创办了美国第一个实验心理学实验室,发起组织了美国心灵研究学会。

尔后,詹姆斯开始把学术兴趣投向宗教和伦理学,并随之在哈佛讲授宗教哲学和伦理学,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和学术作品,包括《信仰意志和通俗哲学》(1897)、《人之不朽》(1898)、《与教师谈心理学、与学生谈人生理想》(1899)和《宗教经验的多样性》(1902)等。几乎与此同时,詹姆斯开始对哲学问题投入了大量精力。1885年,他开始担任哈佛哲学系教授。一直到1907年退休为止。1898年,他在加州大学发表了题为“哲学概念与实际效果”的著名哲学演讲,不仅重新确认了皮尔士在1878年提出的实用主义意义理论,而且也开始系统建构实用主义这一“美国本土哲学”。他先后在英国牛津、美国斯坦福等大学讲学或演讲,阐释并宣扬其实用主义哲学纲领。1907年,他发表其哲学代表作《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随之因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名家布拉德雷对此书的激烈批评而与之展开论战,其论战的成果在1912年集结出版,题为《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除上述著作外,詹姆斯的重要著作还有:《哲学和心理学论

文集》(1908)、《多元的宇宙》(1909)和《几个哲学问题》(1911)等等。1910年8月26日,詹姆斯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病逝。

詹姆斯留下的理论遗产是丰厚的;作为哲学家,他不仅仅是实用主义的奠基者,也是整个“美国哲学”的创始人。因为他的哲学,美国这一年轻的近代化国家才真正挣脱其欧洲哲学的母体,首次从一个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进口国”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哲学形态的国家,而他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哲学爱国者”(佩里语)的荣耀。作为一位怀有崇高人生信仰的智者,他又似乎是矛盾地然而却是坚定地相信作为人类理想价值化身和崇高情怀之寄托的上帝存在。这种坚定的信仰与崇高的价值情怀使詹姆斯在道德与人生问题上既能持守现实主义的道德工具合理性,又能不失却人生关切的终极理想。可惜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受到了程度不一的误解,而且他对人生终极价值和宗教信仰的一片痴心也未能得到人们足够的同情和认识。

对詹姆斯哲学的误解首先源于其“有用即真理”的哲学命题。这一命题连同詹姆斯的整个实用主义哲学,都曾经被我们许多学者(甚至包括像艾耶尔这样的西方哲学家)视为一种缺乏科学理性基础的庸俗哲学、实利哲学或资产阶级的市井哲学。可事实上,詹姆斯的哲学本意仅仅在于:我们不应把哲学当成一种抽象的概念游戏,更不能在哲学已经游离于生活实际并已退却到可怜的抽象理性王国的情况下,还在为它的理论逻辑的辉煌造作而自鸣得意。实用主义正是使哲学从好高骛远的幻觉中返朴归真的有用方法。因此,它首先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而不是纯粹的哲学理论构造。其基本意图在于:“它避开了抽象与不适当之处,避免了字面解决问题、不好的验前理由、固定的原则与封闭的体系,以及幻想出来的绝对与原始等等。它趋向于具体与适当,趋向于事实、行动与权力。”^① 而它的基本特征是:“在

① 詹姆斯:《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译本,第26页。